

译介之旅

潘庆龄:一生钟情波斯文学

□韦 泱

波斯文学,一种遥远而典雅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东方文学(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家)一条重要脉系。年逾九旬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潘庆龄先生,一生致力于波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绩显赫而淡泊低调。作为对我国波斯文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被伊朗总统亲授“伊中学术文化交流杰出学者奖”。

斋藏多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波斯文学译著,如《鲁达基诗选》《赫达雅特小说集》《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等,译者均是年逾九旬的潘庆龄先生。闲时翻阅,常会引我遐想,关于波斯文学的种种未知,以及译者对我讲述过的这些译本的背后故事。

被波斯文学吸引

1930年11月,潘庆龄出生在江苏吴江县松陵镇(今苏州吴江区),至今乡音不改,一口糯软的苏州话,别有韵味。父亲潘奎文是当地开明乡绅,在县里做小官,抗战中日寇进犯,他不愿任伪职,就回家赋闲,教培儿女。潘庆龄记得,家中书籍很多,有《水浒》《红楼梦》《说岳》《陶庵梦忆》等,家里是五进大宅,南西北三间大厢房,五大间正房,后面还有花园、池塘。潘庆龄从小在园里玩,捧一册线装《唐诗三百首》跟父亲诵读。7岁入吴江县立模范小学,一年后跳级读三年级,依然能跟上课程。路充清艰辛,他年少志高,学业一路优秀,在吴江县立中学毕业时,获会考榜首佳绩,于1948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在校就读时,他的课余时间全部泡在了学校图书馆。

一次,他借读到波斯文学的俄文版读物,是一部波斯古典诗歌,倏然间,引发了他对波斯文学的极大兴趣。当时除了极少数清真寺的教职人员,几乎无人懂波斯语。潘庆龄学的是英、俄和西班牙语,无缘学波斯语,令他遗憾。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才由北京大学东语系设立波斯语言专业。图书馆里只有转译本,而中译本更是无处可觅。找不到想读的书,这既让他为之沮丧,又鼓起了他的勇气,立志要翻译和研究波斯文学。很快,四年浙大学业圆满结果,一年支教后,他分配在天津市外事办,任翻译秘书。繁忙的迎来送往外事接待任务完成后,常常在节假日和晚上一点有限时间,他开始进入波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在外事接待工作中,他见过郭沫若、曹禺、老舍等文坛名家。一次,巧遇时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方纪先生,知道潘用功钻研波斯文学,就在1957年,将他调入天津作家协会,后入天津文学研究所,他的波斯文学翻译环境才有了很大改善。

波斯,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国度旧称,主要位于东南亚一带的伊朗。1935年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但波斯一词,一直在中文中使用,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艺术或传统器物,如波斯猫、波斯地毯等,人们耳熟能详,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常见的葡萄、西瓜、水仙、石榴等,都是早年由波斯传入我国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波斯就与我国有着友好往来,并通过“丝绸之路”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潘庆龄率先翻译的是波斯小说。相对波斯文学中的诗歌散文、神话故事,小说在波斯传统文学作品中并不发达。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斯的新文学才应运而生,异军突起,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杰出的小说家赫达雅特、阿拉维和赫加泽依,并称同时代波斯文坛三大作家。

在50年代初,潘庆龄因一部20余万字的俄语小说译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关选题“撞车”,该社编辑知道他对波斯文学情有独钟,就建议他转译波斯文学,并向他热诚约稿。潘庆龄便把翻译的笔触转向波斯小说,他首先接触到的是小说家赫达雅特的作品,认识到他是一位爱国作家,其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对祖国的热爱,他热爱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人民,对他们寄予深厚的同情。

这位生于1903年一个富裕家庭的波斯作家,早年在比利时和法国巴黎求学,并开始文学创作。回到德黑兰后,继续小说创作,于1930年出版小说集《被活埋的人》。除了小说,赫达雅特还写剧本、散文,尤其是经常深入贫民区,了解民众生活,研究民间语言,出版了一部民间波斯故事和传说集《创造奇迹的国家》。由于注重民间生活,他的语言开了文坛风气之先,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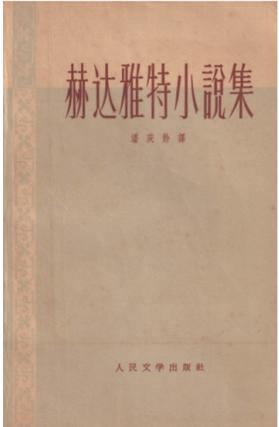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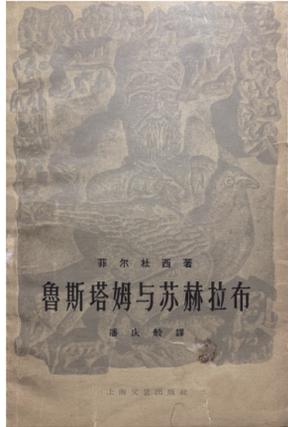
3月18日下午,首届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坛“创造文学的汉语和汉语的文学”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译林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主办,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译林》杂志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国栋,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分别讲话致辞。近三十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共同参会。会议由译林出版社总编袁楠主持,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作学术总结。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心主任何平解释本次论坛的议题“创造文学的汉语和汉语的文学”,认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角度来讲,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汉语文学’。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是回到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思考翻译文学对于文学的汉语和汉语的文学的影响。”何平认为,五四以来,鲁迅等一代又一代作家为白话文树立了汉语文学创作的典范,但他们中很多人同时也是翻译家。翻译文学不仅参与创造现代文学,同时也参与到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和中国现代文学一道共同创造文学的汉语。希望本次论坛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回到当下的文学现场,反思翻译文学对于现代汉语和汉语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他期待通过论坛分享世界各语种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新动向,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锚定当下中国文学,尤其是青年文学。

翻译文学:创造和丰富文学的汉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是由翻译文学参与建构的,现代汉语的规范,一个重要的源头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也参与丰富了“文学的汉语”。

朱晓进梳理了自五四时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文学语言的成熟,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与当时的翻译语言是分不开的。毕飞宇举汉语的“命名”的例子,认为借助于翻译,增加了很多汉语词汇,通过这些词汇懂得了更好的表达,让中国与外国世界有了同频的节奏。小说家小白认为翻译对现代汉语文学和现代汉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他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所有的语言都是混合的,没有一种语言是单一的、慢慢发展出来的。从广义来讲,所有的语言的交换、混合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翻译过程。”他还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的匮乏到八九十年代小说与世界文学同步的表现力证明翻译文



实自然,含蓄有力,活泼生动而又富有形象感。为此,潘庆龄率先翻译了赫达雅特的三篇小说,即《哈吉老爷》《爱国者》《无家之人》,与其他译者的译作一起,于1958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波斯短篇小说集》,并得到读者青睐。这给了他更多信心,也使他感到意犹未尽,继续艰难搜寻赫氏作品研读,增译《忏悔》《兀鹰》等五篇名作,穷数年之功,以一人之力,于1962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赫达雅特小说集》。此书的出版,正遇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和开罗举行,此书在会议期间参与书展,不乏好评。1981年,此书又再版重印。至此,赫达雅特的作品引起我国读者的广泛兴趣,特别在高校,不少教授学者开始研究这位波斯小说家,取得令人瞩目的可喜成果。

2004年,潘庆龄出版《哈吉老爷——伊朗名家中短篇小说荟萃》,一并收入包括赫达雅特和当年其他6位活跃的小说家力作,成为一部较为完备的20世纪上半叶伊朗小说集。此书获得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学的好评,说“如此精彩纷呈的名作荟萃,在当下东方文学领域很是罕见,无论阅读欣赏,还是专业研究,都是令人惊喜的一种独特艺术享受”。

波斯诗歌源远流长

在翻译小说的同时,潘庆龄已着手翻译波斯诗歌。公元10世纪,波斯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国家,当时波斯的一些重要城市,曾经是世界著名的艺术文化中心,文学创作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诗歌创作更为丰富多彩,自古以来素有“诗国”之称。我国著名诗人郭沫若、朱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翻译波斯诗歌《鲁拜集》等。

潘庆龄根据多种俄译本,在195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鲁达基诗选》。他认为,鲁达基(约公元858—941年)是波斯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改进了多种诗体形式,以臻完美。其充满智慧的箴言和警句,极大地影响了同时代诗人,并奠定了波斯古典诗歌的基础,由此诗坛出现群星闪耀的繁荣景象。在波斯文学史上,他被尊称为“诗人之父”。

接着,潘庆龄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费尔多西身上。诗人用了35年时间,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英雄史诗《王书》(又译《列王记》),是世界五大诗人之一(另四人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从《王书》仅存世的10万余行诗中,可分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和历史纪事三部分。此书对其他国家产生过一定影响,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广大民间颇为流行。在欧洲译成英、法、德、意、俄文,德国的歌德、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对诗人的创作有过很高的评价。潘庆龄花了近十年时间,只译出《王书》中的一小部分,书名为《鲁斯塔姆与苏赫拉

参与创造文学的汉语和汉语的文学

□贾 赫

学对文学汉语的作用。南京大学副教授张伟劫坦诚地道出,自己翻译的过程就是重新认识汉语的过程,正因为语言间的对比,才让他更清晰地发现汉语的特点,不断规范使用标准的汉语。汉语十几年来来的变化很大,词汇量不断地扩充是他的直观感受,他以“愿景”一词为例展示了词语被汉语悦纳的过程。方言则代表了汉语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以翻译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为例,文中使用了很多墨西哥地区的方言,都是农民的土话,翻译时,他借用了中国方言中的特色表达,丰富了汉语的可能性。南京大学教授陈星对此表示认同,文学翻译真正推动的是带着问题细读文本的过程,从而促进文学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发展,其实是通过不断地引入国外的语言以及词汇的方式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她认为中文在词性上的包容性是较大的,以严复翻译“归纳”和“推演”两词为例,但中文在句式的结构上思维仍是较为固化的,如长难句少,短句多。跳出这一思维能促进翻译文学及文学汉语更好地发展。作家于是表示,新的词语的命名问题,的确值得商榷,很多新的作品当中出现的新名词,新的概念,具有多重美感的中文词,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的翻译也有希望创造这样的东西?时至今日,翻译文学仍在丰富着文学的汉语。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宽泛意义的“汉语的文学”

何平提出一个问题,现代翻译文学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宽泛意义的现代“汉语文学”?与会的学者们积极地回应认为,某种意义上,翻译文学确实可以视作“汉语的文学”。

《世界文学》叶丽贤认为,由其他语言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构成了当代中国“汉语的文学”中的一部分,并提出“这些作品的情节、思想、思路、章法、意象、隐喻、句法、调性、知识点能进入包括作家在内的国内读者的阅读视野,对他们有所触动或启发,赋予重新打量自身处境的眼光,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写作,或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都可以算是渗入广义的‘汉语的文学’里,成为其骨血或肌理的一部分。”作家及日语译者歌音将《日日杂记》介绍给中文世界,她翻译武田百合子的过程中,激发了创作的热情,创作了长文《口述笔记员的声音》。她说“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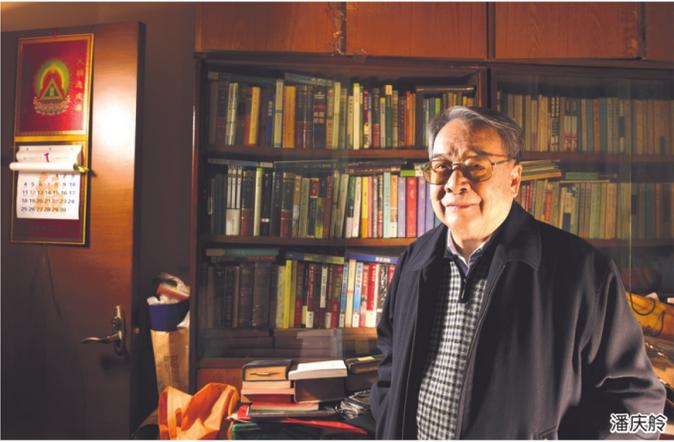
布》。为使读者阅读方便,他在每一章节,插入了不少“译注”。当年,经外国文学专家戈宝权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和副总编蒯斯曈、吴岩推荐,吴岩专程到天津向潘庆龄约稿。此书1964年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即被北京大学等高校列为大学东方文学专业的参考教材。

上世纪70年代初,潘庆龄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后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译审,安居乐业,使他心无旁骛地投入波斯文学研究。1983年,潘庆龄翻译出版《郁金香——波斯古典诗选》,将鲁达基、费尔多西等同时代及稍后的8位波斯古典诗人的作品,分别作了介绍和分析,包括被波斯文学史家称为构筑波斯古典诗歌艺术殿堂的“四大支柱”,即费尔多西的史诗,尼查米的叙事诗,萨迪的哲理诗,哈菲兹的抒情诗等。

由此深入诗人个体的创作研究,他撰写出版了《波斯诗圣费尔多西》,1990年10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次年荣获中国外国文学会东方文学首届学术专著一等奖,实现了他“译研并重”的学术理念。东方文学权威、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高度评价:“译非翁史诗,非同小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年,应德黑兰大学邀请,潘庆龄与来自全球的非学专家,出席费尔多西《王书》诞生一千年纪念大会。会上,他宣读论文《费尔多西在中国》,并将他多种波斯文学中译本敬献此届世界盛会,展示中国翻译家的风采与荣耀。

令人陶醉的波斯故事

说起波斯文学,人们自然会想起举世闻名的《一千零一夜》,此书又名《天方夜谭》,经阿拉伯人编成故事集,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对世界各国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堂吉



潘庆龄

珂德)等名著,以及欧洲的音乐、绘画等,直接或间接都受到其影响。高尔基说《一千零一夜》是“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丰碑”。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就有奚谷、周作人、包天笑、汪原放等,将其从日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成中文,许多故事流传广泛,几乎家喻户晓。正是受此影响,潘庆龄在接触到大量波斯文学后认为,波斯人自古以来以善于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著称。波斯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有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创作素材的优良传统。

几乎在翻译波斯古典诗歌之前,潘庆龄就广泛阅读到有关波斯的古代故事,从英译本中选择了20余则约15万字的波斯故事家讲述的故事,完成译著《九亭宫——古代波斯故事集》一书,并于1959年写毕《译序》。虽然此书因种种原因,迟至1982年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新中国第一本波斯古代故事集推出,大受读者欢迎,首印66000册,很快售罄。波斯故事如此受到追捧,潘庆龄也始料不及,欣喜之余,他继续翻译此类故事,加以增订,于1999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新天方夜谭》。2001年,再次增补译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魔幻山庄——波斯故事集》。

波斯民间故事与波斯古典诗歌同样浩如烟海,且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其中有冒险故事、爱情故事、历史传说和轶闻掌故,如同《一千零一夜》一样,在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大小组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故事的背景有时是埃及,有时是希腊,有时是印度,有时是中国,可谓宽广无垠。比如,在一则《库吉德沙赫与中国公主马艳丽》的故事中讲到,中国建筑师狄福应邀前往波斯,帮助设计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九亭宫,马佑班国王的王子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向中国公主马艳丽求婚。这一情节说明自古以来,中、波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谊。有一位波斯作者,以此为素材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大胆丰富的想象,曲折惊险的悬念,已然突破了民间故事的框框,成为从波斯民间故事转化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实际上,波斯民间故事已成了东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先声,对于后世的文学艺术不仅起着丰富的作用,并且还使它们增添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无独有偶。在《魔幻山庄》这则波斯古代故事中,讲的是传说中波斯王子来华求亲记。中国公主梅古姑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宁为聪明的穷人妻,不做愚昧的豪门媳。她以面试形式,一一考察求婚者,以答案最佳者,同意与他喜结连理。故事以大团圆告终,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潘庆龄觉得,波斯古代神话故事家大多富有神奇的想象力,甚至将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迥异趣事,融汇成一个气势恢宏、五光十色的连环故事中,通过变幻莫测的浪漫主义手法,将故事编得奇妙绝伦,以至当今,许多现代派作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也采用这种经典方式,以丰富自己的作品内蕴和艺术魅力。

由于潘庆龄在翻译上肯下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的苦心,力求在最微小处,也要尽可能渗透原意,将原著的全部风格和特点,都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他七十年持之以恒,从事波斯文学的翻译的研究,多种译著持续重版再印,成为外国文学译本中的长销书。

潘庆龄在翻译理念上,一句是“译研结合”,还有一句是“东西兼顾”,除了译介东方文学中的波斯文学,他还翻译了诸多英美文学,如《嘉莉妹妹》《瓦尔登湖》等,这当另文撰述了。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全面译介波斯文学,且成绩斐然的中国翻译家,潘庆龄得到了许多同行学者的称赞。学贯中西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看了潘庆龄的译著,对他说:“国内译介波斯文学,你有开创之功。”

进与探索。东南大学教授韦清琦着重强调了“信息对称”的重要性,他以南京“世界文学之都”和科举博物馆的英文翻译为例,指出翻译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应该尊重地方的精神,体现真正的文化内涵。复旦大学李双志和朱绩崧都回应了“信息对称”原则。朱绩崧指出目前文学翻译存在的核心问题,还是出在“信、达、雅”的“信”上,译者应充分理解原作的含义,以相对简洁的语言去体现出原作者本来的意思。李双志坦言,作为译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在中文和外文之间不断跳跃,对参。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仍是相互促进的。

青年文学与ChatGPT焦虑

世界青年文学创作的趋势、作家的写作受到新媒体与科技的影响、科技发展中机器翻译的强势是息息相关的,ChatGPT对文学创作、文学译者的冲击早已成为讨论热点,究其根本,保住文本的复杂性,文学翻译是无可替代的。

于是敏锐地感受到了世界文坛和世界图书市场的动态变化。她从这些年翻译的文本中发现了简单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受到新媒体和科技的影响,文本变得简单化,作者渴望被翻译,甚至渴望被机器翻译。面对炙手可热的ChatGPT的挑战,文学翻译应积极面对变化。黄昱宁表示这是一个文本无处不在的时代,世界青年文学创作主题趋势就是如此。网络科技迅速发展,一方面,以萨莉·鲁尼的小说《正常人》和《聊天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的受欢迎为例,说明新技术对文学产生的更深层的冲击,其实是互联网化的世界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文本越来越符合年轻人的心理,变得更加简单化。另一方面,机器翻译仍有局限性,人类文学翻译仍有不可替代性。小白也认为,有些东西是机器翻译无法做到的,机器无法理解原作者写这句话、这个人物、整个文本的意思,而这需要翻译家去揣摩与把握。这是文学翻译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世界青年文学创作的趋势,除了文本越来越复杂之外,还有一种趋势是“被拉平了”,已经缺乏了多层次的、复杂的意义”,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何保住文学的复杂性,保住文本的复杂和意象的能力,也是文学翻译未来还继续存在的理由。

岳雯为本次论坛作学术总结,她认为,文化是一代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真正创造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汉语文学。大家以新的美学经验,为历史创造新的东西。发展文学翻译事业,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贡献。